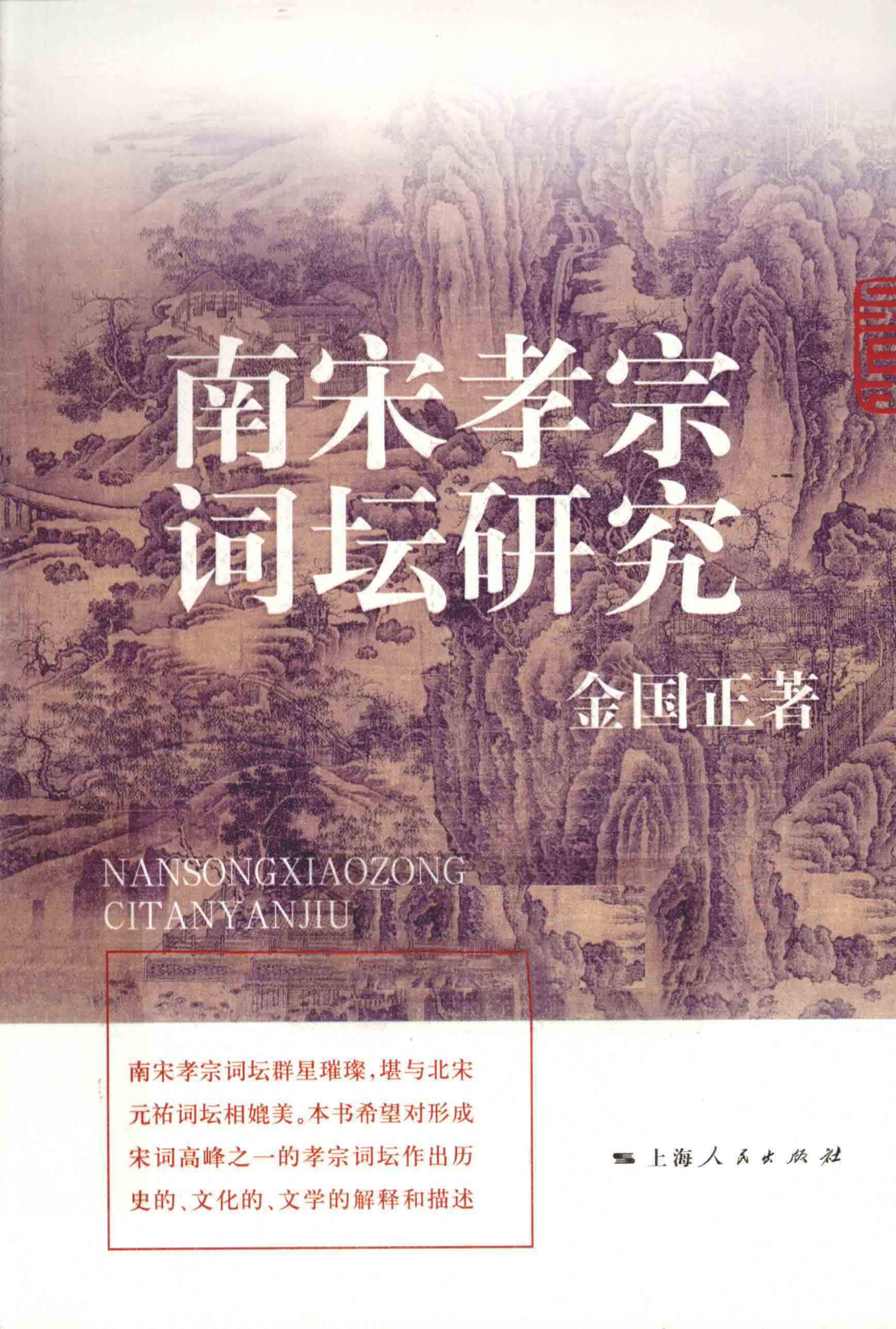




南宋孝宗 词坛研究

金国正著

NANSONGXIAOZONG
CITANYANJIU

南宋孝宗词坛群星璀璨,堪与北宋元祐词坛相媲美。本书希望对形成宋词高峰之一的孝宗词坛作出历史的、文化的、文学的解释和描述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南宋孝宗 词坛研究

金国正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南宋孝宗词坛研究/金国正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ISBN 978 - 7 - 208 - 09912 - 8

I. ①南… II. ①金… III. ①宋词—诗词研究—中国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57786 号

责任编辑 曹勇庆

封面设计 姜 明

南宋孝宗词坛研究

金国正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15.5 插页 2 字数 242,000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9912 - 8/I · 882

定价 32.00 元

前 言

历史上的天才常常成群地集中在一定的时期内。有宋一代,前之欧苏曾王等文学大家、司马光这样的史学巨擘、程氏兄弟等理学宗师集中于北宋庆历后的六七十年间;后之中兴四大诗人、大词人辛弃疾与姜夔、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和陆九渊等,则集中于南宋乾、淳年间,至开禧年间始告衰微。这样的时期无疑给了研究者足够的书写空间,就词坛而言也具备了更多横向观照的可能。

因此,北宋苏轼的时代与南宋辛弃疾的时代可说是宋词史上前后辉映的两个高峰时期。从现今的研究状况看,对苏轼时代作整体观照的有彭国忠的《元祐词坛研究》;在南宋词的分期研究中,则关注南渡词人较多,先后有台湾黄文吉的《宋南渡词人》和大陆王兆鹏的《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2003年浙江大学黄梅博士的论文仍着眼这一课题。而对宋遗民词人的研究,先有华东师大刘荣平的博士论文《宋遗民词人群体研究》(2000年),后又有陕西师范大学牛海蓉的《元初宋金遗民词人研究》(2004年)。相比而言,研究者对南宋辛弃疾时代词坛的整体把握之作反而较少。有之,也多从词坛内部着眼,未能充分顾及前述学术文化全面繁荣的时代因素。对这一时段的宋词研究,论者普遍关注的是特定风格群体的研究,如辛派词人研究、格律词派(或风雅词派)研究等等,而鲜有对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词学作整体观照者。我将自己的研究目光锁定在这一时期,便是基于以上的考察。

作为研究的第一步,自然要确定研究范围的具体时限,这就涉及南宋词的分期问题。对南宋词的分期,有的人分为两段,如龙榆生先生在《两宋词风的转变》一文中就将南宋词划分为豪放词派之发展、典雅词派之昌盛两个阶段;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唐宋词选》则以开禧末为界分为前后两段。前者考虑到了南宋词坛两大阵营的先后消长关系,但以之作为分期标准,前后衔接就显得不甚清楚;后者认识到开禧北伐失败带来的南宋朝野

人心之变以及给词坛的影响,然而终究显得过于粗略。将南宋词分作三段的,有胡云翼《宋词研究》:“南渡时的词”、“偏安以后的南宋词”、“南宋末年的词”;陆侃如、冯沅君合著的《中国诗史》:“战争时期”、“苟安时期”、“亡国时期”;杨海明《唐宋词史》:“大动乱到偏安时期”、“偏安时期”、“覆亡时期”。他们在具体的时间界限上虽有不同,但其基本思路还是一致的。“苟安时期”或“偏安时期”在理解上各家略有不同,总的说来断限过长,不利于对这一时期的词坛的把握。王兆鹏先生提出四段“代群分期”说,即南渡词人群、中兴词人群、江湖词人群、遗民词人群。立论精微,其分段最可信从。他所确定的中兴词人群的活动时间,上自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下至宁宗开禧三年(1207年),以辛弃疾的去世为结束标志。

王兆鹏所确定的这一上下时限,既有时局变动的考虑,也照顾到词坛人事的变迁,颇为恰当。从时局看,隆兴元年孝宗登基,倡言恢复,士气为之振。在与金关系上孝宗时期基本保持相当和平的局势,南宋朝廷虽局处一隅,社会经济却因此得到长足发展。南宋中兴局面,至此才可说名副其实。这种局势一直保持到开禧三年北伐失败为止,此后南宋社会才真正一蹶不振。从词坛人事变迁来看,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自北来南,标志着词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其后作家纷出,既有像陆游、范成大、杨万里这样已具诗人名望的作家,也有像姜夔、陈亮等在这一时期走上词坛并享誉词林的“新人”。他们之间交游唱酬,或慷慨疾呼,或低回吟唱,共同创立了词史上的又一个高峰。而到开禧三年(1207年)辛弃疾去世后,同时词坛健将如范成大(1193年)、陈亮(1194年)、杨万里(1206年)、刘过(1206年)、姜夔(1209年)^①、陆游(1210年)等先后凋零,一代盛况遂告结束。本书的上下时限,便以此为准。

然而在命名上,“中兴词人群”的提法仍可商榷。如果说王兆鹏的“代群分期”说作为一个完整的分期说,将“中兴词人群”置于“南渡词人群”与“江湖词人群”之间,有着一定的参照而不致招人误解,以之作为单篇论文的题目却是不够严谨的。因为“中兴”是一个政治性概念,有着其特定的含义,“中兴词人群”的提法容易造成概念的混乱。“中兴”一词本指国家由衰退而复兴,如邓肃有《瑞鹧鸪》词记金人废徽、钦二帝时的感受:“北书一纸惨天容。花柳春风不敢浓。未学宣尼歌风德,姑从阮籍哭途穷。此身已落

^① 陈尚君:《姜夔卒年考》,《复旦学报》1983年第2期。

千山外，旧事回思一梦中。何日中兴烦吉甫，洗开阴翳放晴空。”“何日中兴”一句，即指什么时候才能够重振宋室。在这个意义上，甚至整个南宋相对北宋来说都可称作“中兴”。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称“中兴四大诗人”，而四人又称“南宋四大家”，其“中兴”盖指整个南宋时期，四人为南宋诗人之首。又如《南宋馆阁录》及其续编《南宋馆阁续录》，原名《中兴馆阁录》及《中兴馆阁续录》，两书均为宋人所编，四库馆臣将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才改为今名。而两书所覆盖的时代几及南宋之全部^①，也许南宋人正是自视本朝为相对北宋的“中兴”时期。一般意义上的宋室中兴则可作如下两种解释：一是指宋高宗赵构收拾残局、重建宋室的过程，即高宗一朝的历史。如南宋熊克所撰《中兴小纪》起于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迄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明确限定了这一历史阶段。二是指高、孝、光及宁宗前期即南渡以来至开禧北伐时期。虽云偏安一隅，但战争毕竟不再是社会生活的主流，原来已经趋向发达的江南经济因了宋室南移的机缘而更加繁盛起来，开禧北伐失败使多年蓄积一旦而空，宋室才真正趋于末路。“中兴词人群”所定位的时代是孝宗、光宗和宁宗前期，如果以《中兴词人群体研究》为题，而不计高宗时期，多少是存在历史性缺陷的。

另外，虽然在时段上我采用的是与王兆鹏的“中兴词人群”相同的一段，但在词人群体构成上，我的范围却要略微窄一点，不包括史达祖、高观国等一批在宁宗前期开始活跃起来的词人。在我的研究视野中，孝宗时期的词坛是主体，而光宗和宁宗前期只作为孝宗词坛的合理延伸来处理，这也使我不便于利用那样一个现成的题目。当然，我也考虑过用年号为题，如彭国忠的《元祐词坛研究》，作《淳熙词坛研究》。然而“淳熙”并不具备像“元祐”那样的丰富历史和文化内涵，不宜于用它来作为一个时代的代名词。基于这样的一些考虑，索性用帝号来命名这个时代倒不失为质朴的做法，遂定名为《南宋孝宗词坛研究》。以“词坛研究”而不以“群体研究”为名，同时也表示本书不采取像《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那样的以特定群体为研究对象的做法^②，而是立足于孝宗时期的词坛全貌，甚至有意加强以往

^① 《南宋馆阁录》十卷由陈騭撰，记建炎元年（1127年）至淳熙四年（1177年）的馆阁制度；《南宋馆阁续录》十卷，无撰人姓名，其内容紧接前录，自淳熙五年至咸淳五年（1269年），下距临安陷没仅七年。

^② 王兆鹏《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第15页，确定其研究范围是“生活、创作历经北宋末徽宗朝和南宋高宗朝的一群志士词人”，而不是南渡期的所有词人。

所谓非主流的一些词人的研究分量。因为孝宗时期的词坛,如果从群体角度切入,则很容易又陷入“豪放词派”或“格律词派”(辛派或姜派)的两分思维中去,同时也难以获得研究的突破;而辛弃疾和姜夔(特别是辛弃疾)在孝宗词坛毕竟是伟大的存在,如果对他们视而不见又肯定会失却研究的客观性。出于这样的考虑,本书有意凸显辛弃疾和姜夔背后的那群词人,从他们与辛、姜等人的关系来说明这个时代之所以成为词史高峰的原因。

历来研究这一时段的词学,基本集中于辛弃疾与姜夔二家,或者以他们二人作为对立两派的代表,以爱国词派(或豪放派、辛派)和格律词派(或姜派、骚雅派、风雅派)来划分词坛格局。这样阵营分明的划分或可收一目了然之效,却未必反映词坛的实际情况。我们先看几种常见文学史的相关描述。

游国恩等编的人民文学版《中国文学史》第三册“宋代文学”部分,在南宋前期文学下列张孝祥、杨万里、范成大等,接着以专章介绍陆游、辛弃疾,而把姜夔、朱熹等列入南宋后期文学一章中,作家的分期归属方面显有不妥。论辛派词人,一方面称“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最大的爱国词派”,另一方面论列作家仅指出陈亮、刘过及其后的刘克庄、刘辰翁等,很难说明孝宗词坛的辛派之气候。对姜夔及其他词人的描述分量也显然较轻。复旦版《中国文学史》将前述杨、范、陆、辛、朱都纳入南宋中期文学一章的框架内,在述及姜夔时,既认识到他与辛弃疾同时,又“因姜夔习惯上归于南宋后期,故本章不作介绍”。该书对陈亮、刘过外的辛派词人略有涉及,如韩元吉、杨炎正等。孝宗词坛的面貌在该书中仍无从体现。

程千帆、吴新雷著《两宋文学史》是宋代文学的断代史,对宋代文学的把握自有其细致深刻处。如对辛派词人的规模说明就更为详尽,认为“和辛弃疾同时或稍晚的时代里,受辛词影响的词人约五十多家”,但在格局分布上仍是以“辛弃疾与南宋的豪放派爱国词”与“姜夔和南宋的婉约词”相对。将辛词定位在豪放、爱国这一点固然抓住了其本质,却也容易忽略它的丰富与多面性。就其影响来说,也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性情相合作家间的创作面貌容易相似,论辛词影响就会简单地置之于辛派笼罩下,而不足以说明其中的复杂性;二是事实上缩小了辛词的影响面,如汪莘的词有不少明显带有稼轩影响,而汪并不在辛派之内。

杨海明的《唐宋词史》对孝宗词坛的说明不多,然而他在“南宋词坛鸟瞰”中高屋建瓴地论述了南宋词盛极而衰的历史规律,并且将词坛的两股

忧国之音和政局联系起来,从南宋文人的雅致中探寻“雅词”的形成内因,能够深入地说明孝宗词坛的一些问题。陶尔夫、刘敬圻的《南宋词史》是南宋词的专门史。他们将南宋词史分为“词坛的重建期”、“词史的高峰期”、“词艺的深化期”、“宋词的结获期”四段,脉络更清晰,孝宗词坛的面目也较为完整。“高峰期”与“深化期”的前面部分实即孝宗词坛时期。限于体例,该书对词坛内与外界的复杂互动关系揭示不足;而且把朱熹放入“婉约词的进展与深化”一节内,也有削足适履之嫌。

林玫仪主编的《词学论著总目》汇集 1901—1992 年的词学论著目录,刘扬忠、王兆鹏等主编《词学研究年鉴》(1995—1996),《宋代文学研究年鉴》(1997—1999)、(2000—2001)与其相衔接,构成了 20 世纪以来词学研究论著的总目录。从中来看孝宗时代词人的研究情况,应该说具有相当的全面性。孝宗词坛主要词人的研究论著数量大致统计如下:

辛弃疾	1 669 条
姜夔	438 条
陆游	421 条
陈亮	96 条
张孝祥	78 条
范成大	39 条
刘过	32 条
杨万里	14 条
朱熹	11 条
张鎰	7 条

其他零星有所论述的词人有史浩、俞国宝、洪迈、袁去华、曹勋、韩元吉、赵长卿等。综观这些研究,存在着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研究分布极不平衡,所谓豪放派或辛派词人研究的文章比例大大超过姜派或其他承续传统风格的词人。

其二,对一些原本不太受重视的词人研究力度有所加大,如韩元吉、史浩、袁去华等。但论题选择随人而定,缺乏整体观、系统观、联系观。

其三,相当一部分论文仅是词作赏析,研究意义不大。对于已受重视的词人来说这无碍大局,而对原来默默无闻的词人来说,仅以赏析代替理

论分析显然无助于研究的全面与深入。

以上是作家作品的研究状况。从流派研究的角度看,20世纪以来关于爱国派或豪放派、辛派的论文约有四五十篇,而关于姜派或风雅派的研究文章仅在二十篇左右,这也与前面所述的词人研究状况相应。但是从流派角度研读南宋词,一般来说涵盖面均及于整个时代,并不仅仅针对孝宗词坛而言。如论爱国词派当然可以把南渡词人作为起点,论述辛派也自然延及宋末,论风雅词派则一贯以姜、吴、周、张为线索。这些流派研究无疑地都要结穴于孝宗词坛。

对以往研究的回顾使人产生如下疑惑:将所有(或大多数)词人纳入到豪放派和格律派(风雅派)中去是否妥当;豪放派或辛派的影响在当时是否真如一些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占据着词坛主流;其他词人与辛、姜的关系,在今天看来自然是呈现出众星拱月之势,但在当时词坛是否存在着明确的追随意识?

如果说高宗时期的词人们经历的是由和平走向战乱,那么紧随其后的孝宗时期词人则正好反之,从动乱颠沛又转而为晏安承平,两个时代的词人在心理状态和创作观念上都有所不同,在词的内容和艺术表现方式上也就相应地有所转换。南渡词人既有过繁华的记忆,又有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在战争环境的刺激下,一味的红香艳软之词失去了时代土壤,曾经颇受争议的豪放或旷达词获得了理所当然的生存空间,一度被人坚持的词“别是一家”的观念也悄悄被人遗忘^①。孝宗时期词人的生活总体是和平安定的,只是这一种和平安定带着屈辱的印记。凡有志有为者几乎都经历过那种“热望与失望”的心理历程,而无力或无意亲近政治的江湖名士追求醇雅的意趣,实际上也是对现实的一种无奈逃避。抑武重文作为“祖宗家法”在南渡时期一度受到外患冲击而动摇,然而厌战的社会心理经过上层统治者卑躬屈膝的投降政策强化后,民族精神就更其怯懦而柔弱了。一个明显的史实是,绍兴初年“和议”还是受到朝野“舆论”的普遍抗拒的,高宗和秦桧等人的投降政策只能凭借政治高压来推行;孝宗即位后多数在位士大夫却已经成为“现实派”,支持和议。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南渡期那种风云之气在整个词坛有消减之势,英雄志士词人所抒写的“经济之怀”更多地

① 提出词“别是一家”的李清照也是南渡词人,但她的词学观念明显带有承平时代的痕迹。她所坚持的主情致典重等词学主张在南渡词人的创作实践中多数被打破了。

落实在理想的期望中,而英雄失路的悲愤压抑才是他们词中的主旋律。随着社会的全面安定,在南渡期受压抑的花间余风又有抬头之势,而更多的词人将目光转向日常生活,并且加以诗化、雅化,致力于词的社交功能,磨砺词笔,自觉追求词的圆美境界。

和平的时代环境为词的再度繁荣创造了条件。仅从创作数量上看,在五十年不到的时间里,词坛出现了二百三十多名词人(这还仅是留存至今有作品的词人),作品总数在六千首以上。其中有词集或经后人辑成专集的即有五六十家之多,作品数量在十首以上的有八十多家。其中固然有辛弃疾、姜夔这样的以词名世、取得卓越成就的大词人,复有陆游、范成大、朱熹、陈亮这样诗词兼擅的多面手,还有像张孝祥、韩元吉、刘过等词坛名家,而其他如袁去华、曹勋、史浩等堪称作手的词人更不在少数,可以说真正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借用王兆鹏的“范式”理论,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孝宗时期词坛的一个特点,即东坡范式发展到稼轩形成高峰状态,清真范式到了白石手中也有了令人瞩目的新变,就是花间范式也有抬头之势,张宏生论述艳词发展的三个阶段,特别提到南宋这一段^①,确实是久为人所忽视的,而且也与当时人的记述相合。

这是一个文化全面繁荣的时代,也是一个令英雄志士扼腕的时代,词坛所发生的一切似不能完全从词坛内部去寻求内在的理路,因此本书不仅关注孝宗词坛的词人交游、词创作、词学观念以及词艺术的完善等,更把词坛内外的互动关系作为重要任务来完成,希望能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对这一时期的词学作出一定的解释。

^① 张宏生:《清代词学的建构》,第66—67页。

Contents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孝宗词坛的历史背景	1
第一节 孝宗之志与乾淳士风	2
第二节 孝宗之治与文化盛世	14
第二章 孝宗时期的文艺思想	24
第一节 “崇苏热”下的盛世文艺观	25
第二节 抗战派的文学主张	32
第三节 理学家的文艺观	35
第三章 词人的生活模式与歌词创作	44
第一节 仕宦生活与歌词创作	47
第二节 退隐生活与歌词创作	54
第三节 江湖生活与歌词创作	68
第四章 性情:宋词与理学的一个契合点	81
第一节 理学与诗学中的“性情”	82
第二节 理学与词学的契合	93
第三节 从艳情到性情	100

第五章 以辛弃疾为中心的词人群	110
第一节 江、淮、两湖时期的词人群	117
第二节 带湖时期的词人群	127
第三节 瓢泉时期的词人群	132
第六章 其他词人群体的集聚	141
第一节 以宫廷为中心的词人群	142
第二节 以帅臣豪门为中心的词人群	149
第七章 孝宗时期的词学观念	164
第一节 词体观:小道与尊体	165
第二节 创作观:游戏与寄托	176
第三节 功能观:无用与有用	187
第八章 孝宗时期词艺的深化	197
第一节 辨音与严律	198
第二节 抒情与咏物	204
第三节 以文为词	213
结束语	222
附录:“斜阳烟柳” 所怨何事——辛弃疾《摸鱼儿》词新解	224
参考文献	228
后记	236

第一章

孝宗词坛的历史背景

文学史的写法，一度落入时代背景、思想内容、艺术成就以及作家作品的影响等等这样的窠臼之中。文学史与社会政治发展史的关系并不一定同步，社会政治经济的繁荣稳定并不一定意味着文学的繁荣，对此人们已早有认识。但是具体到特定的文学体裁，我们又常常发现某些文学体裁在某个阶段受社会文化的制约特别明显，与时代风云变幻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因此“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①之说仍是极有道理的，尤其在一些尚未发展成熟的文学体裁中。如词的第一次兴盛期在唐末五代，词这种新兴的文学体裁在末世的罅缝里获得意外的发展；再如元曲的兴盛，也是与蒙古入主中原、文士流落失职的时代环境密切相关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文学的大势而言，文学与社会政治等时代因素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成熟的文学体裁尤其有着自己的发展轨迹；而某些特定文学体裁在特定阶段的发展，则需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寻找其嬗变的内在原因。

孝宗时期宋词的发展正处于一个特殊的阶段。宋词发展到南宋孝宗时期，已经由纯粹的应歌之词转变为正式的文字“伎俩”，也就是说词体处于向成熟状态的转型过程接近完成之时。而判断词体是否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文学体裁，既要看当时的文人对它的认识态度和接受程度，看他们是否能够欣然将词纳入到他们的文集之中；也要看词体的功能发掘是否已经充分，词的表现空间是否已经充足无余；还要看词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之中是否已经形成一整套的艺术规律，已经积累了丰厚的艺术创作经验。以上三个方面各有其衡量的意义，对词的认识态度和接受程度关系到人们的

^① 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第479页。

词学观念；词的艺术规律等的把握也即是词艺的探索，在本书的第七和第九章分别有专门的论述；而词体的功能发掘以及词的表现空间的拓展与历史时代所提供的舞台关联最大。

孝宗词坛的历史背景因此格外引人关注。孝宗继位，改变了高宗时期长期奉行的投降国策，给人们带来恢复中原的希望，使士人重新燃起中兴的理想。然而符离一败，隆兴和议成，宋金之间从此维持了大体安定的和局达四十年之久，社会经济是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与发展，特别是江南一带，由于临安成为“行在”，呈现出相当繁荣的态势。然而宋金对峙的结果，不是增强了双方的军事实力，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耗散了彼此的斗志，使它们在新崛起的蒙古族铁骑前丧失了应有的抵御力。对这样一种貌似和平安定而实际危机四伏的局面，有识之士凭借他们的敏锐感觉是嗅察到的。唯其如此，沉酣于逸乐的浮靡风习才更令人担忧。如果说血雨腥风的南渡初期形势迫使词体往慷慨多气或者隐沦感伤方向发展，那么继之而来的晏安局面又重新释放了词体和婉软媚的一面。但又不仅仅如此，经历过时代洗礼的词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全面繁荣景象，花间之音经历了一度的沉寂以后又恢复了其生命；苏轼的清旷之音杂入了“大声鞺鞳”的时代强音；婉雅的词风更受到普遍的推崇，形成一股崇雅的风尚。

孝宗时代的特殊历史状况决定了那些有志恢复的爱国者终究不得其志，而且也正是这样的时代土壤促进了江湖文化的最终形成，而这两者于孝宗词坛均关系甚巨。以前者言，孝宗时代并无元奸大恶当道，孝宗也是有为之君，然而有志者欲有所作为却往往举步维艰。正邪之争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可以为金刚怒目式的抗争，士风人心的转移对有志之士的压抑却是无声而又巨大的，稼轩多“潜气内转”式的作品与此应不无关系。

第一节 孝宗之志与乾淳士风

宋朝自太祖赵匡胤立国，即留下“燕云十六州”不能收复的缺憾，而边患一直困扰着宋人，从辽、西夏、金到后来的蒙古，一再威胁乃至最终颠覆了赵宋政权。“恢复”成为宋人恒久不能释怀的“情结”，“靖康之难”则将这种情结强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衣冠文物遭到灭顶打击，徽、钦

二帝被掳北上，康王赵构被拥戴为帝后几番奔窜，最终瑟缩于东南一角……与金“势不两立”、“不共戴天”成为南宋人的普遍意识。然而可悲的是，这种“恢复”情结在柔儒的统治阶层里并没有化为相应的行动。高宗固然吓破了胆，一意求和；几经“揉驯”的士大夫也多安于现状，讳言“恢复”。讳言“恢复”并不意味着没有“恢复”之梦，只是朝野上下把希望寄托在金人的内乱上，对金存有一种幸灾乐祸的病态心理，“联蒙灭金”就是这种心态支配下的狂乱决策。孝宗在这样的时代里承继帝位，其恢复之志既有普遍的民众心理基础，又有着不同寻常的“国是”变更背景，因此成为支撑起世态人心的一根精神支柱，也是词坛抗战复国之音的政策源头。

孝宗之帝位，就历史上帝统相延的传统来说，有其非常态的一面。这首先是因为孝宗并非高宗赵构的嫡子，而是宋太祖一系的子孙。高宗之所以选定孝宗为继承人，固然有后嗣无继的原因，也与“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的传言大有关系。宋太祖之死及传位太宗之事充满疑点，太宗一系子孙拥有天下百二十年而太祖后裔不与，使得靖康之难披上一层“太祖降祸”的诡异色彩。徽宗子康王赵构虽得帝位，却是连年奔窜，不遑宁处。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扬州溃逃后惊吓过度甚至丧失了生育能力。对上述传言及“天厌大宋”的迷信迫使他于绍兴二年选宗子赵伯琮（后来的孝宗赵昚）入宫作为备选皇子，然而名位久久未正（此中既有内宫吴氏与张氏争宠的背景，也有高宗生母韦太后不放弃高宗育子希望的阻力，更有高宗借此手段控制未来皇帝的意图）。直至绍兴三十年（1160年）高宗才正式确立赵瑗（孝宗即位前迭经更名）为皇子，并于两年后传位，孝宗之位得来可说非常艰辛。孝宗继位的第二个非常态性体现为高宗是以内禅的方式传位给他的，这种传位方式因此在南宋前期政治史上一而再地上演（孝宗以是传之光宗，光宗则是蒙在鼓里被动地传位于宁宗）。历史上的内禅往往有着复杂的权力斗争背景，即使是亲父子也难免骨肉相残。高宗大权独揽而竟然能够放手，其根本原因是宋金和局被打破，政局难以收拾，需要由新人来重振朝廷以及社会秩序。

孝宗以太祖之后而得位，本来就有“中兴宋室”的大任担当；高宗内禅，又等于承认和议不可恃，这两个外部原因使孝宗在即位之初能够以相当积极的姿态来实现其“恢复之志”。就孝宗本人而言，长期生长于内廷而名分未定的经历也使他养成严毅的性格。尤其微妙的是，秦桧持和议取得高宗

信任,并在绍兴八年开始独相地位,他附和高宗提升伯玖(孝宗为皇子前的竞争对手)政治地位的意图^①,使孝宗在长时间里处境险恶,险失其位。孝宗与秦桧长期处于对立状态,他后来坚持恢复之志、防范相权势力膨胀等表现与他这一阶段的经历密不可分。绍兴三十年孝宗为皇子时已经“骑射翰墨皆绝人”^②,他明显是把自己终生的志业定位于“恢复”,“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③。孝宗即位之初的锐志多见史载,如:

隆兴初,孝宗锐志复古,戒燕安之鹄,身御鞍马,以习劳事,仿陶侃运甕之意。时召诸将击鞠殿中,虽风雨亦张油帘,布沙除地。^④

所谓“击鞠”,是古代的一种球类运动,高俅曾因精于此道获徽宗的赏拔。孝宗习此,不是像宋徽宗那样玩物丧志,而是以之强身健体。另一则记载也可证此:

寿皇在宫中,常携一漆拄杖,宦官宫妾莫得晚视。尝游后苑,偶忘携焉,特命小黄门取之。二人竭力曳以来,盖精铁也。上方有意中原,故阴自习劳苦如此。^⑤

《朱子语类》卷一二七还记载了刘珙在乾道四年(1168年)奏事便殿时所见孝宗闲暇时用来练习“据鞍骑射”的木马。这些日常生活上的细节刻画出一个英毅有为的孝宗形象。而政策、制度、建制上的措置更加能够说明孝宗志在恢复的宏图:

孝宗有恢复之志,置恢复局,览华夷图,建国用使,开都督府,立奉使司兵。自偏裨而下各有长记,将自准备而上又有揭帖。江北诸城,浚陴增隍,沿淮分戍,鼓声达于泗颖,盖无一日不为恢复之事。^⑥

孝宗自己有诗纪怀:“平生雄武心,览镜朱颜在。岂惜常忧勤,规恢须广大。”(《新秋雨霁》)^⑦孝宗的“雄武心”,为天下所知,也为后人所知,《宋史·孝宗本纪》称其“聪明英毅,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并不是夸大之言。然而终孝宗之世,恢复大业并无多少起色,宁宗朝的开禧北伐至于一

①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一绍兴八年八月条下所引《赵鼎事实》,第326—645页;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720页揭示之。

②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四绍兴三十年二月甲子条,第327—620页。

③ 《论语》“里仁”篇,《论语译注》,第36页。

④ 岳珂:《桧史》卷二“隆兴按鞠”条,第37页。

⑤ 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一“铁拄杖”条,第16页。

⑥ 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九乾道六年六月条引吕中语,第113页。

⑦ 张端义:《贵耳集》卷上引,第2页。

败涂地,也可见孝宗以来的蓄积不厚不广。造成如此局面的原因至为复杂,并不能由孝宗一人负责。孝宗的“恢复之志”虽然多半停留于“言”的层面而无法上升到“行”的阶段,但对于士态人心的振拔却至为重要。爱国之士的恢复理想时时燃起,与他们对孝宗的期望分不开;这种期望的依据正在于孝宗本人的恢复之志。一般的士大夫虽然也习于燕安,但既然皇帝以恢复为志,就多少维系住了一些恢复的信念。我们看到“恢复之音”并不仅仅出现于爱国志士之口,不管他们是出于诚心还是矫饰,孝宗之志对人心的激励或是矫枉之功不可泯灭。

最明显的例子是曹冠。曹冠,字宗臣,号双溪居士,东阳(今属浙江)人。居秦桧门下教其孙埙,为“秦门十客”之“门客”(或曰“馆客”)。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与埙同登甲科,历官平江府教授、国子录、太常博士兼权中书门下检正诸房文字。秦桧死后他理所当然地遭到罢斥,然又在乾道五年(1169年)应举中第。淳熙元年(1174年)再被论罢新任,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知郴州任,旋致仕,卒年八十。曹冠有《燕喜词》一卷存世,共六十三首。他的词情怀畅达,少顾影自怜之态。令人称奇的是他的词时有“平戎”、“歼虏”之意,如《浪淘沙·述怀》:“清介百无求。民瘼怀忧。席珍藏器效前修。自**负平戎经国略**,**壮气横秋**。二纪叹淹留。寻壑经丘。醉吟适意且遨游。致主丹心犹未老,天意知不。”如果我们对照他所撰写的秦桧谥议:“故太师赠申王秦桧,光辅圣主,绍开中兴。安宗社于阽危之中,恢太平于板荡之后。道德光天地,勋业冠古今……”^①岂非形成辛辣的讽刺!我们当然不必因他一度依附秦桧而将他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也许他确实洗心革面,力改前非,也许他有所悔疚,自为掩饰。同时代人詹效之评论他说:“检正曹公,行兼九德,浑然天成。文章政事,渊源经术,廉介有守,既和且正。”^②则其中恐怕以虚美的成分居多。他的“豪言壮语”尚有“功名事业,壮怀岂肯蹉跎。待拥雕戈。洗胡尘、须挽天河”(《夏初临》)、“情何憾,君亲未报,功业志难忘”(《满庭芳》)、“高歌横剑志平戎,酒量与天阔”(《好事近·己丑重阳游雷峰》)、“丈夫志业,当使列云台,擒颡利,斩楼兰,雪耻歼狂虏”(《蓦山溪·渡江咏嘲》)等,简直可与辛弃疾、陈亮等人的词相比。事实上他更多的是学东坡词的清旷,之所以出此豪言,可能有迎合恢复之

①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〇,第327—376页。

② 詹效之:《燕喜词序》,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第228页。